

他因写“沃兰德侦探小说系列”而一举成名。
他的作品被译成29种文字，在仅有900万人口的
瑞典就已售出350万册，在德国自1998年底以来，
售出450万册，创造德国成人读物发行量的一个
奇迹。

第五个女人

[瑞典] 亨宁·曼克尔 / 著
郝素玲 郭英剑 王弋璇 / 译



河南文艺出版社

0112189

第五个女人

[瑞典] 亨宁·曼克尔 / 著
郝素玲 郭英剑 王弋璇 / 译



I532.45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第五个女人/(瑞典)亨宁·曼克尔(Mankell, H.)著;
郝素玲等译. —郑州:河南文艺出版社, 2004.2

(沃兰德侦探小说系列丛书)

ISBN 7-80623-447-0

I. 第… II. ①亨… ②郝… III. 侦探小说—瑞典
—现代 IV. I532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4)第 068113 号

著作权合同登记号:图字 16-2002-035 号

出版发行 河南文艺出版社	开本 32
本社地址 郑州市经五路 66 号	印张 14.25
邮政编码 450002	字数 357000
承印单位 郑州市欣隆印刷有限公司	印数 1—5000
经销单位 各地新华书店	版次 2004 年 2 月第 1 版
纸张规格 850 毫米 × 1168 毫米	印次 2004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
标准书号 ISBN 7-80623-447-0/I·337	定价 20.80 元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请与承印单位联系。

J532.45

3

引 子

信是1993年8月19日到达于斯塔德的。

上面盖的是非洲邮戳，她断定是母亲写来的，便没有马上拆开。

她希望在平和而安静的时候读信。从信封的厚度看，里面肯定有很多页。她已经三个多月没有收到母亲的信了，这封信里一定有不少消息。她把信放在咖啡桌上，想等晚上再读，可又隐隐感到不安。这次母亲为什么是打印了她的名字地址呢？毫无疑问，答案就在信里。

深夜时分，她打开通向阳台的门，在花盆旁坐下。这是个美好、温暖的仲秋之夜。或许今年很难再有这样的夜晚了，秋天已经悄然而至。她打开信，读了起来。

读完信，她不禁痛哭失声。信是一个女人写来的。笔迹甚至措辞都很讲究，写信的女人尽可能仁慈地讲述了所发生的可怕实情。

信上署名是弗朗索瓦丝·贝特朗，一个警官。她的官衔不十分明确，但她负责那个国家重大杀人案件的刑事调查工作，所以她了解到了5月份发生在非洲北部一个偏远荒漠城镇里的这些事件。

案件事实清楚，但特别可怕。四位修女，都是法国公民，被不

BCL616105

明身份的袭击者割伤颈部惨遭杀害。杀人犯没有留下任何痕迹，只有遍地凝结的厚厚的血迹。

可是，还应该有一个女人，一个瑞典旅行者。在杀人者持刀出现的那个夜里，她恰巧来拜访这些修女。她护照上的名字叫安娜·安德，六十六岁，持旅游签证来到这个国家。护照里夹着一张未注明日期的往返机票。由于四位修女同时遇害已经够耸人听闻的了，而安娜·安德好像又是独身旅游，迫于政治压力，警方决定不提及这第五个女人。他们只说那个致命的夜晚她并不在那里，同时报道说她因车祸而丧生，然后就把她埋葬在无名荒冢。就在此时，弗朗索瓦丝·贝特朗参与到了此案中。她在长信中写道：一天早上，上司打电话给我，叫我开车去修道院，任务就是销毁这个瑞典女人的护照和随身物品。

好像安娜·安德从来没有到过或在这个国家停留过一样。她已经不存在了，从所有官方记载中消失了。弗朗索瓦丝·贝特朗从衣柜后面找到了被调查人员忽略的一只旅行袋。里面有安娜·安德写的信，信是写给居住在遥远的瑞典叫于斯塔德镇的女儿的。弗朗索瓦丝·贝特朗说很抱歉她读了这些私人信件，并请求一位嗜酒成性的瑞典艺术家帮忙翻译给她。他读信时， she 就把信的内容记了下来。

那时，弗朗索瓦丝就已经对第五个女人的遭遇感到痛心。不仅仅是因为她在这个国家惨遭杀害，而且因为她自己深爱自己的国家。尽管父亲出生在法国，但她心在非洲，并为分裂祖国的内乱而感到十分痛心。她不愿意违背自己以及国家的良知，错上加错地把这个女人消除掉，甚至拒绝为安娜·安德的存在负责。弗朗索瓦丝为此开始失眠。最后，她决定给已故女人的女儿写信，告诉她真相。尽管要忠诚于警察职业，她还是强迫自己采取了行动，只是请求为她的名字保密。我在告诉你真相，她在长信的最后说，也许我把发生的一切告诉你是个错误，可是我又该怎么办呢？

弗朗索瓦丝·贝特朗把第五个女人没写完的信和护照装进了信封。

她的女儿没有读这些信。她把信放在阳台的地上，哭泣了很久。直到凌晨，她才站起身来。走进房间，她木然地坐在餐桌旁，头脑一片空白。可是突然，事情好像变得简单了。她意识到，这些年来什么都没做，原来一直都在等待。她一直在等待这个事实。为什么等待？现在她明白了。她有一个使命，她不需要再等待了。到时候了，母亲去世了，一扇大门豁然打开。

她站起身，取来放着自己裁好的纸条的盒子，还有她藏在床底下大抽屉里的一个大账本。她把叠起来的纸条摆在面前的桌子上，她知道，共有四十三个。她开始一张接一张地把它们展开。

带叉号的是第二十七张。她打开账本，用手指顺着向下查，查到了要找的那个目标。她注视着她记下的名字，慢慢地，一张面孔清晰起来。然后，她合上账本，把纸条放回盒子。

母亲死了。她不再犹豫了。现在一切都无可挽回了。她要为在悲痛中工作一年做好充分准备。她重新来到阳台，点燃一支烟，注视着醒来的城市。一场暴风雨正从海面袭来。

7点刚过，她上床睡觉。现在是1993年8月20日早晨。

第一章

晚上刚过 10 点,他终于写完了。

最后几节非常难写,他花费了很多时间。他一直想用忧郁而又优美的词语,但几经修改,结果都被扔进了废纸篓。

有几次他甚至决定放弃。可是现在,诗就摆在书桌上。那里充满着他对几乎从瑞典绝迹的啄木鸟的感伤情怀。自 20 世纪 80 年代初起,这里的人们就没有再看到过啄木鸟了。它们成了又一个即将被人类消灭的物种。

他站起身,伸展了几下双臂。随着年岁的增长,连续几个小时的伏案工作使他越来越感到吃不消。

老人就不该再写诗了,他想。七十八岁时,思维就不好用了。可他又认为这不对。只有在西方,老人才被娇纵,或者才被轻蔑地同情。在别的国家,老年被视为智慧的辉煌期。只要拿得动笔,头脑清晰,他就可以继续写诗。他没有太多其他能力。很久以前,他曾做过汽车经销商,而且是这个地区最成功的一个。他以强硬的谈判而闻名。他的确卖出过很多汽车。在最辉煌的年代,他在图默梨拉和舍布都有分部。他挣了足够的财富来保证他优裕的生活。而诗歌是他最感兴趣的,桌上的诗句给了他难得的满足感。

拉开窗帘,窗外是一片延伸到大海边的田野。他走到书柜旁。

他出版的九卷诗集,成排地摆放在书柜上。但每卷售量极少,总共不超过三百本。没有售出的都在地下室的硬纸箱里。它们是他的骄傲和快乐,尽管他早已决定有一天要把它们烧掉。他要把硬纸箱搬到院子里,然后放一把火。等他得到无论是来自医生的,还是自己生命终结的征兆的死亡判决时,他就会毁掉这些没人买、甚至没人愿意麻烦把它们扔进垃圾堆的诗卷。

他看看架子上的书。他一生都在读诗,也能背诵许多。他没有幻觉,他的诗不是最好的,但也不是最差的。40年代末以来,大约每五年出版一本,每一本中都有一些可以同最好的诗歌相提并论的诗句。可他的职业是汽车经销商,而不是诗人。他的诗歌也不被文化界所接受,他没有得过任何文学奖励。他的书也是自己掏腰包出版的。

他曾把自己的第一本诗集送到斯德哥尔摩,他们给以简短的、事先打印好的回复。一个编辑还怕麻烦做了个人评论。没有人愿意读仅仅关于鸟类的诗,白灶巢鸟的精神世界也没有意思,编辑写道。

从此以后,他不再在出版商那里花时间。他自己出版:简单的封面,不加任何修饰。里面的诗句才是最重要的。不管怎么说,这些年来,很多人读过他的诗,很多人表达过对他的欣赏。现在,他又写了一首新诗,主题是身上中间带点的啄木鸟,一种在瑞典绝迹的美丽的鸟。

要做歌颂鸟的诗人,他想。我写的一切几乎都是关于鸟类的:鸟翼的颤动,黑夜中的疾驰,远方求爱者的呼唤。鸟的世界折射出生活最神秘的部分。

他拿起一张纸,最后的一节很好。他把纸放回桌子上。走过大房间时他感到背部一阵疼痛。病了吗?每天他都在注意着身体开始衰退的信号。他身体一直很好,不抽烟,吃喝适度,这种生活方式保证了他的健康。可毕竟很快就八十岁了。他生命的终点就

要来临。来到厨房,他从一直处于工作状态的咖啡机中倒出一杯咖啡。

刚刚完成的诗使他既难过又高兴。我的暮秋之年,他想。合适的名字。我写的任何东西都将是最后一个。9月了,秋天了。无论是日历上,还是在我的生命中。

他端着咖啡回到客厅,小心地坐进陪伴了他四十年的棕色皮安乐椅里。这是当年为了庆祝自己在瑞典南部得到大众汽车特许经营权时买的。安乐椅旁边的桌子上,摆着一只阿尔萨斯狼狗沃纳的照片。在所有陪伴他一生的狗中,他最想念这一只。越老就越孤独。你生活中周围的人渐渐死去,甚至你的狗都随风而去,很快你就会孤独一人。在生命的某个过程中,每个人都会这样。最近,他就试图去写这方面的诗,可是似乎总也写不完。也许他应该再努力。可是,他知道怎么写鸟,却不知道怎么写人。他理解鸟,人却深不可测。难道他没有试图去了解自己吗?写他不了解的东西,简直就像非法入侵别人的领土。

他闭上眼睛,突然记起50年代末或60年代初的关于“10 000克朗问题”的电视节目。那时还是黑白电视。一个斗鸡眼、头发溜光的年轻人选择了“鸟”这个话题。他回答了所有的问题,得到了一万克朗的支票,那时,这可是个天文数字。

他没有进过演播室,没有戴着耳机坐在那个房间里。他就坐在这把安乐椅里。他也知道所有问题的答案,而且没有一次需要花时间去思考。可是他没有得到一万克朗,没有人知道他对鸟类渊博的知识。他只是继续写诗而已。

一种声音把他从白日梦中惊醒了。他在渐渐暗淡的房间里听着,院子里是不是有人?他很快打消了这个念头。只是他的幻觉罢了,上了年纪就意味着得忍受焦虑。他把门锁得很牢。楼上的卧室里有一把短枪,厨房的抽屉里还有一把左轮手枪。如果有人贸然侵犯这个于斯塔德北部的偏僻农房,他能够自卫。他决不会

犹豫。

他从椅子上站起身，背部又是一阵剧痛。疼痛一阵阵袭来。他把咖啡杯放到厨房台子上，看了看表，快夜里 11 点了，该走了。他眯起眼看了看厨房窗外的温度计，外面是七度。气压计在上升。西南风正轻轻吹过斯科纳。他想，今夜，成千上万的候鸟，将展开翅膀从头顶飞过向南飞行。他看不见它们，可他在黑暗中能感觉到。五十多年来，他在田野上度过无数个秋夜，体验鸟飞过时的快乐。以至他时常感到整个天空都在移动。

在冬季即将来临之前，鸟儿迁移的冲动是天生的，它们能数小时地在天空中飞行。整个黑暗的夜空随着鸟翼而震颤，开始了一年一度的朝向圣地的迁徙。

与夜空飞行的鸟相比，一个孤零零而又平凡的老人算什么呢？他视这种行为为神圣。站在黑暗中，他用年事已高的巨大身躯感受着候鸟的离去。春天到来，他又站在那里等候它们。它们的迁徙是他的信仰。

他走到大厅，摸摸衣服挂钩。然后又回到客厅，拿起桌子旁凳子上的短外衣穿上。上了年纪还意味着更容易着凉。

他再次看看书桌上完成的诗。或许他能够活到写完足够的诗来编辑成第十本，即最后一本诗集。他已经取好了名字：黑夜中的巨大身躯。

再回到大厅，他穿上外套，戴上帽子。他打开了门，外面，秋天的空气中弥漫着湿润泥土的馥郁气息。他随手关上门，使自己的眼睛适应夜色。花园看起来很荒凉。远处，可以看到于斯塔德闪烁的灯光。他住的房子距离其他邻居太远，这是能看到的惟一光亮。天空几乎很清晰，布满了星星。天际处，几片云若隐若现。今夜，迁徙的鸟群肯定会经过他的庄园。

他出发了。他的房子很旧，只有三个厢房。尽管到现在还没有完工，可他已经花了很多钱来整修这座房子。他要把它全留给

隆德的文化协会。他没结过婚，没有孩子。他卖汽车发了财，有狗，还有鸟。

没什么遗憾了，沿着小路朝自己搭建的塔楼走的时候，他这样想。

这是个美丽的9月的夜晚。可是，有种东西使他感到不安。他在路上停下来，听了听，可是只听到轻盈的风。他继续走。难道是疼痛，他背部突然的剧痛使他烦恼？这种烦恼好像是来自他内心的某种东西。

他再次停下，转过身来。什么也没有，就他一个人。小路向下倾斜，又通向一块高地。就在高地前有一条宽宽的沟，他在上面铺架了小桥。他的塔楼就在地上的最高点。他不知道自己多少次往返于这条路上。他熟悉每一处拐弯，每一道沟坎。可他还是很小心谨慎，他不想冒险摔伤了腿。老人的骨头很脆弱，他知道。

一只猫头鹰叫了起来。好像在很近的地方。树枝发出了声响，声音来自塔楼后面的树林。他站定住，每根神经都警觉起来。猫头鹰又叫了起来，接着是一片寂静。他低声咕哝了一句，继续朝前走。

他低声说，老了却害怕了，害怕鬼魂，害怕黑暗。现在，他已经看见塔楼夜空中黑色的轮廓了。再走二十米，他就到了深沟的桥上。他继续走。猫头鹰不见了。一只黄褐色的猫头鹰，他想。毫无疑问，是黄褐色的。

突然，他停了下来。他已经来到了沟上的桥边。塔楼上有情况，他眯起眼，竭力想在黑暗中看清楚，但辨认不出是什么。

我又是在幻想，他想，一切都照旧。我十年前建造的塔楼没什么变化，是我的视力模糊了，仅此而已。他又向前走一步，跨上桥，感觉到了脚下的木板，眼睛继续盯着塔楼。

真的出错了，他想，它比昨晚高了一米。或者说像梦境，我在看我自己站在塔楼上？

塔楼上有人。一个人的轮廓，一动不动。一阵惊悸，犹如一阵冷风传遍他全身。随后他很气愤，竟然有人非法侵入他的领地，未经他的容许贸然登上他的塔楼。很可能是个偷猎人。

他对塔楼上的人喊了起来。没有回答，没有动静。他又不敢断定了：他的眼睛欺骗了他？眼睛太模糊了。

他又喊，还是没有回答。他走上了桥。

桥板突然坍塌了，他头朝前直冲下去。沟有两米多深。

他感到难以名状的疼痛，不知来自何处，却像灼热的箭头刺穿身体。疼痛剧烈得使他连叫的力气也没有。咽气之前，他意识到自己还没有到沟底，他一直被悬挂着。

他最后的念头是候鸟，他上空的候鸟，天空正朝南方移动。

最后一次，他试图把自己从疼痛中解脱出来，然后一切都结束了。

现在是1994年9月21日晚11点20分。那天夜里，成群结队的鸫鸟和红翅膀的乌鸦正飞往南方。

它们来自北方，穿过法尔斯特布高地，沿着西南航道，向着遥远的、等待着它们的温暖地方飞去。

当一切沉寂之后，她小心地从塔楼上下来。她用手电照照沟里：霍尔格·埃里克松已经死了。她关上手电，站在黑暗中。然后悄然离去。

第二章

9月26日,星期一,5点刚过,住在于斯塔德中部玛利亚加坦的库尔特·沃兰德就醒来了。

他睁开眼的第一件事就是看自己的双手。它们被晒成了棕褐色。他靠在枕头上,听着秋雨敲打在窗户上。想起两天前在哥本哈根的凯斯楚普机场结束的旅行,一种满足感油然而生。他同父亲一起在罗马度过了整整一周时间。那里很热。下午酷热难耐时,他们就在市民别墅花园里搬个长凳,沃兰德让父亲坐在树阴下,自己却脱下衬衣,脸对着太阳。这是假期里他们惟一的冲突,父亲不明白为什么他这样虚荣,非要把自己晒成棕褐色。

真是个愉快的假期,沃兰德躺在床上想,比我想像的还顺利。

他看看表。今天得去上班了。可他并不着急,还可以在床上再躺一会儿。他伸手取来昨天夜里浏览过的报纸,看国会选举的结果。选举期间他在罗马,所以他就投了缺席票。社会民主党的得票率是百分之四十五。可这又怎么样呢?能有什么改变吗?

他把报纸放到地板上,又想起了罗马。他们住在鲜花广场附近一家不太贵的旅馆里。在屋顶平台上可以观赏城市的风景。早晨他们在那里喝咖啡,计划一天的行程。沃兰德的父亲知道自己想看什么。沃兰德曾担心父亲想看的太多,但又没有精力。他观

察着父亲烦躁或者健忘的迹象。阿耳茨海默氏病，一种奇怪名字的疾病正潜伏在他身上，他们都知道。可是在整个愉快的一周里，父亲的状态很好。沃兰德意识到整个旅行已经成了过去，成了记忆时，喉头一阵发紧。他们再也无法一起去罗马了。

在那里，他们度过了最亲密的时光，这是近四十年来的第一次。沃兰德思考着自己的发现：他们很相像，甚至超出了他愿意承认的程度。他们都爱早起。沃兰德告诉父亲说旅馆在7点以前不供应早餐，他就抱怨过一次。他拉着沃兰德来到前厅服务台，用混合着斯科讷方言、几个英语单词、一些德语短语还有些支离破碎的意大利单词，他解释说 he 想要早餐，而不是晚餐，决不要晚。由于某种原因，在让旅馆最少提前一个小时供应他早餐时，他还说了几次 *passaggio a livello*，否则他们就要另选旅馆。*passaggio a livello*，父亲说，前厅招待惊异却又带着敬意地望着父亲。

当然，他们得到了6点的早餐。后来，沃兰德在词典里查了 *passaggio a livello* 这个词，发现它的意思是铁路交叉口。他猜测父亲大概把它同另外一个词弄混了，可是他很聪明，没有问那个词是什么。

沃兰德听着雨声。回头看看，短短一周的罗马之旅，好像成了让人无尽沉醉的经历。父亲的固执己见，不单单体现在早晨什么时候喝咖啡上。他充满信心地指导着儿子游遍全城。沃兰德明白，父亲一生都在准备着这次旅行。这是一次朝圣，是沃兰德可以共享的朝圣。他是父亲旅行中的一个分子，一个随叫随到的仆人。他并不太明白这次旅行究竟有什么秘密的重要性。但父亲来罗马旅行，好像是来看他早已经历过的某种东西。

第三天，他们参观了西斯廷教堂。沃兰德的父亲差不多花了整整一个小时凝视米开朗基罗的天花板。看他真像在看一个人向着天空发出无声的祈祷。沃兰德很快就颈部痉挛，便放弃了。他知道他在看美丽的东西，但父亲能看到的绝不止这些。曾有一会

儿他想,父亲是不是要在大型的天花板壁画上寻找一只松鸡或者日出。可他后悔自己有这样的想法。毫无疑问,作为商业画家,父亲是在充满敬畏地用自己的观察力审视着大师的作品。

沃兰德睁开眼,望着外面的雨。

就在那天晚上,他感觉父亲在为自己的秘密行动做着准备。他们是在威尼托大道吃的饭,沃兰德觉得这太奢侈,但父亲坚持说他们吃得起。毕竟,这是他们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一起到罗马。然后他们漫步穿过城市往回走。夜晚很温暖,他们周围人很多,父亲谈到了西斯廷教堂的天花板。他们两次迷了路,最终回到了旅馆。父亲第一次发火后受到了极度的尊敬,他们取了钥匙,接受了前厅招待礼貌的鞠躬。回到自己房间,沃兰德躺在床上,听着街道上的声音,或许他想到了巴伊巴,或许正要入睡。

突然,他完全清醒了过来。有种东西使他感到不安。他穿上大衣,下楼到了大厅。一切都很安静,值夜班的招待正在前厅柜台后看电视。沃兰德买了一瓶矿泉水。招待员是个年轻人。他告诉沃兰德,他夜里工作是为了资助自己的神学研究。他一头黑色卷发,出生在帕多瓦,名叫马里奥,讲一口漂亮的英语。沃兰德拿着瓶子站在那里对招待说,如果夜里父亲来到大厅或者离开旅馆,就把他叫醒。年轻人看看他,他很惊异,但没有表现出来,只是点点头说,当然,假如老西格诺尔·沃兰德夜里出去,他就立即敲 32 号房间的门。

事情发生在第六天夜里。那天他们在古罗马广场附近游览,参观了多里亚·潘非利画廊。晚上,他们穿过从市民广场通往西班牙台阶的漆黑的地下通道,然后在一家饭店吃了饭。付款时沃兰德大吃一惊,这可是他们的最后一夜,这个只能用非常愉快来形容的假期就要结束了。沃兰德的父亲表现出了他在整个旅行中同样无穷的精力和好奇。他们走回旅馆,路上在一个咖啡店喝了杯咖啡,并用一杯格拉巴酒干杯。到旅馆后,他们取了钥匙。沃兰德一

上床就睡着了。

凌晨1点30分,有敲门声。最初他没意识到自己身在何处。他迷糊着跳起来,打开了门。夜班招待站在门口,说他的父亲刚刚离开旅馆。沃兰德套上衣服,很容易就追上了父亲,但他保持着一定距离,跟着父亲。他的预感真对。当街道渐渐狭窄起来时,他意识到他们是往西班牙台阶走去。他还保持着距离。然后,在温暖的罗马黑夜中,他看到父亲爬上了西班牙台阶,来到顶端有两个塔的教堂坐了下来,远远地像个黑点。沃兰德藏在阴影里。父亲停留了大约一个小时,然后站起身,缓慢地下了台阶。沃兰德继续跟着他——好像这是他所承担过的最奇怪的任务——很快,他们来到了特雷维喷泉。父亲没有投掷硬币,而是久久地站立着,望着水从巨大的喷泉中飞溅而出。在昏暗的灯光下,沃兰德可以看见他眼睛里的闪光。

最后,他跟着父亲回到了旅馆。

第二天,他们乘坐 Alitalia 飞机飞回哥本哈根。同来时一样,父亲坐在靠窗的位置。沃兰德一直等到他们乘上返回利姆港的轮船,才问父亲旅途是否愉快。他点点头,含糊地说了句什么,沃兰德知道,他不可能要求更多的热情了。耶特鲁德在利姆港等着他们,开车把他们送回家。沃兰德在于斯塔德下了车,那天夜里晚些时候他打电话问候时,耶特鲁德告诉他,他父亲在书房画他的商标图案:宁静的景色中的落日。

沃兰德起了床,来到厨房,煮了些咖啡。为什么父亲要坐在西班牙台阶上呢?他在喷泉那里想什么呢?他找不到答案。可是他知道,他已经窥视到了父亲最隐秘的内心世界。他知道,自己永远都不能问他在罗马的独行之谜。

咖啡正在煮,沃兰德来到盥洗室。他高兴地看到,自己看起来很健康,精力充沛。太阳晒得他头发褪了颜色。那些意大利面食肯定使他增加了几公斤,可是他没有用盥洗室里的秤。他感到很

轻松,这才是最重要的。他很满意这次旅行。

意识到几个小时后自己就要重新做一名警察并没有使他烦恼。通常,在度假后返回工作时他都会感到烦恼。最近几年来他很懒散,曾经有好几次都认真想过要换个工作,做个保安什么的。可到最后他还是选择了警察。这个认识逐渐成熟,无法再改变,他永远都不会做别的什么了。

洗澡时,他突然想到了炎热的夏天和瑞典在世界杯中的胜利,痛苦地想起竭力搜查总是剥下受害人头皮盖的连续杀人犯的情景。在罗马的一周里,他尽力把这件事从自己的头脑中抹去,现在,记忆又潮水般地涌了回来。离开一周了,但什么也没有改变。

他在餐桌旁一直坐到7点。大雨仍然冲刷着窗户。意大利的炎热已经成了遥远的记忆,秋天已经来到斯科讷。

早上7点30分,他离开公寓,开车来到警察局。马丁松也同时到达,停在他的车旁边。他们在雨中匆匆道声好,便冲进局里。

“旅行怎么样?”马丁松问,“欢迎回来。”

“我父亲很高兴。”沃兰德回答。

“你呢?”

“很好,也很热。”

埃巴,在局里干了三十多年的接待员,用灿烂的笑脸迎接他。

“意大利的9月也能把人晒成褐色?”她惊异地问。

“可以,”沃兰德答道,“只要你呆在太阳下。”

他们走过大厅,沃兰德意识到自己应该给埃巴带个小礼物。他很为自己的粗心烦恼。

“这里一切很平静,”马丁松说,“没有重大案件。几乎什么也没发生。”

“或许我们可以期待一个平静的秋天吧。”沃兰德没把握地说。

马丁松去取咖啡了。沃兰德打开自己办公室的门。一切都同他离开时一模一样。桌子上空空的。他挂好外衣,把窗户打开一